

# 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永樂大典》 十九庚形字史料價值辨析

辛 德勇

2013年5月，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以宣紙包背裝形式，按照原大仿真影印了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三冊《永樂大典》。其中卷九八一“二支”兒字一冊（“二支”之第一百二十八冊），過去亦未曾依據原書以原大仿真的形式印行，我已另外撰寫了專稿，略述其史料價值。

同時影印的另外兩冊，為卷七七五六之七七五七“十九庚”形、侗二字一冊和卷八八四一之八八四三“二十尤”油、游等字一冊，過去雖然有過影印，但開本侷促，製作之精良遠不及這次新的印本。長期供職於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室並從事該館善本書志編寫的沈津，曾先後在《巨細精粗 粲然明備——也說〈永樂大典〉》、《萬紫千紅的濃縮——記“哈佛燕京”75周年展出的5種善本文獻》等幾篇文章中對這兩冊《永樂大典》簡單做過介紹<sup>1</sup>，其中最為詳細的一篇，題作《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二本〈永樂大典〉》，此前曾以《“哈佛燕京”的兩本〈永樂大典〉》為題，收錄在《書林物語》這部文集裏<sup>2</sup>。國家圖書館這次影印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永樂大典》，附印有一冊說明，載錄了沈氏這篇文章，想藉此來為讀者詳細瞭解這冊《永樂大典》的具體內容“提供參考”。

不過，檢讀沈文，可見其對相關內容的介紹，存在相當嚴重的謬誤。鑒於沈文被採用這種形式，附着於該冊《永樂大典》並行，為讀此《大典》者所必見，因而有必要鄭重加以辨析，以正視聽，免得貽誤讀者。

由於沈津在論述這兩冊《永樂大典》史料價值時所造成的疏誤，性質相同，所以，在這裏我想僅以卷七七五六之七七五七這一冊為例，來做說明。如前所述，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這冊《永樂大典》，為“十九庚”下“形”、“侗”兩字的內容，然而“侗”字祇有諸韻書、字書對該字的注音釋義，文獻價值有限，故在此亦略而不談，僅僅針對沈津的說法，探討一下“形”字部份的史料價值。

如同沈氏文章已經談到的那樣，在這冊《永樂大典》書衣的內側，尚貼有清人纂修《四庫全書》時四庫館臣莊陔簽注出來的擬輯錄佚書名目。莊氏注云“《采真集》、韓滉《澗泉日記》、馬明叟《實寶錄》、《玉融新對》、《燕語考異》、《古今事通》、《江淮異人錄》、《燈下閒談》、《三境圖論》、《尚意譬喻論策》、《敬齋泛說》、《續後漢書》、汪藻《浮溪集》、馬明叟《實寶錄》、《劉文貞公集》、《鄭氏談綺》、《唐鱸》、姬知常《雲山集》、《僧文珣集》共書拾玖種計式拾玖條，乾隆三十八年 月 日發寫 謄錄”。不過其中“馬明叟《實寶錄》”前後重複羅列，故實際上祇簽出有十八種書。

沈津文中具體述及這冊《永樂大典》引書史料價值的地方，祇是緊繼上述四庫館臣簽注擬輯佚書籍的事項之下，有如下一段論述：

“形”字卷內將自古以來古籍中於“形”之哲學與物理，收羅殆盡。其輯佚各書，

<sup>1</sup> 沈津《巨細精粗 粲然明備——也說〈永樂大典〉》和《萬紫千紅的濃縮——記“哈佛燕京”75周年展出的5種善本文獻》兩文，見沈津文集《書城風弦錄——沈津學術筆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20—23，頁60—66。

<sup>2</sup> 沈津《書林物語》（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頁19—29。

如《灌畦暇語》、《江州志》、《南康志》、《燕語考異》、《玉融新對》、《有官龜鑑》、《蕭了真集》、《李方叔文集》、《群書足用》、《江淮異人錄》、《內翰談苑》、《三境圖論》、《史樂書》、《經學明訓》、《唐鱸》、《四書章圖》、《僧文珣集》、《太玄寶典》、姬知常《雲山集》、吳筠《步虛詞》、陳纂《葆光錄》、唐柳常侍《言旨》、宋薛季宣《浪語集》等，恐是今已湮沒之典籍。

這段話開頭謂這冊《永樂大典》“將自古以來古籍中於‘形’之哲學與物理，收羅殆盡”，講得很不得當。蓋清四庫館臣即曾指斥此書“割裂龐雜，漫無條理，……殊乖編纂之體”<sup>1</sup>，稍後施國祁同樣抨擊說：“《永樂大典》一書，顛倒篇章，割裂文句，誠淺夫之所作。”<sup>2</sup>這種情況，在這一冊中，當然同樣存在，初不必為之諱飾，更不宜諛頌其事，這至少不是很負責任的學術性評價。

其次，沈氏文中“其輯佚各書”以下諸語，讀之完全不知所云。按照正常的邏輯來分析，“其輯佚各書”的“其”字，本來應該是指清四庫館臣，但若是這樣，就應該祇論述四庫館臣簽註出來的十八種書籍，可是沈氏所說《灌畦暇語》、《江州志》、《南康志》、《有官龜鑑》、《蕭了真集》、《李方叔文集》、《群書足用》、《內翰談苑》、《史樂書》、《經學明訓》、《四書章圖》、《太玄寶典》、吳筠《步虛詞》、陳纂《葆光錄》、唐柳常侍《言旨》和宋薛季宣《浪語集》這十六種著述，卻都不在四庫館臣標記的範圍之內。若謂在四庫館臣所說之外，尚有可供輯佚之書，那麼，就不應該再羅列《燕語考異》、《玉融新對》、《江淮異人錄》、《三境圖論》、《唐鱸》、《僧文珣集》和姬知常《雲山集》這七種四庫館臣已經簽出的書籍。總之，不管怎樣理解，都解釋不通。

那麼，沈津在這裏是不是想說不管四庫館臣是否簽註，實際上祇有他列舉的這些書籍，纔稱得上是我們今天亟待輯佚的“今已湮沒之典籍”呢？這同樣是講不通的。下面就讓我們逐一察看一下沈氏舉述的這十六種書籍的存佚情況。

(1)《灌畦暇語》——此書不著撰人。《四庫提要》考證作者為“中唐以後人”，又謂“其書《唐志》、《宋志》皆不著錄，惟陳振孫《書錄解題》始著其名，然朱子作《韓文考異》於《岐山下》一首註云‘世有《灌畦暇語》一書，謂子齊初應舉，韓公賞之，為作丹穴五色羽’云云，則其傳已久矣”<sup>3</sup>。檢傅增湘《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知此書有明末高承埏稽古堂《新鐫羣書秘簡》本，清乾隆三十四年陸烜刊《奇晉齋叢書》本，曹溶在清初所匯錄《學海類編》本等多種印本流傳<sup>4</sup>，《四庫全書》亦據《奇晉齋叢書》本錄入此書。

儘管如四庫館臣所述，傳世之本，並非完書，“此本……未有李東陽跋云‘余頃儻京城之西，有賣雜物者過門，見其篋有故書數種，大抵首尾不全，《灌畦暇語》一編，尤為斷爛。余以數十錢購得之，因料理其可讀者，才得三十餘條’云云，則此書乃東陽所理之殘本。今‘彭寵奴’一條佚其後半，‘韓愈詩’一條佚其前半，凡闕二十八行有奇，又非東陽所理之舊矣。然核其詞旨，確為唐人著述，雖殘闕終可貴也”<sup>5</sup>，實則李東陽跋文，更清楚寫明，在其整理刊佈者之外，“餘不可刪取者，尚三分之一，甚可惜也。他日好事君子，如有善本，幸為我足之”<sup>6</sup>，但本冊《永樂大典》引述的“磐古之死”云云一條文字<sup>7</sup>，已經見於《四庫全書》所依據的《奇晉齋叢書》本，並且二者之間在文字上也基本沒有差異。如果一定要比

<sup>1</sup> 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影印清浙江刻本）卷一三七《子部·類書類存目》“永樂大典”條，頁1165。

<sup>2</sup> 清施國祁《禮耕堂叢說》（清光緒間陸心源輯刻《湖州叢書》本）之《舊鈔本敬齋古今黃註說》，頁30a。

<sup>3</sup> 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〇《子部·雜家類》“灌畦暇語”條，頁1034。

<sup>4</sup> 傅增湘《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一〇上《子部·雜家類·雜說》，頁68。

<sup>5</sup> 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〇《子部·雜家類》“灌畦暇語”條，頁1034。

<sup>6</sup> 唐佚名《灌畦暇語》（清乾隆三十四年陸烜刊《奇晉齋叢書》本）卷末附明李東陽跋語，頁15b。

<sup>7</sup> 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新印《永樂大典》卷七七五六之“十九庚”形字“磐古化形”條，頁2b。

較二者文字優劣的話，那麼，《永樂大典》本“頭東嶽，腹爲中嶽”這句話，還不及《奇晉齋叢書》本之鐫作“頭爲東嶽，腹爲中嶽”妥當<sup>1</sup>。

(2)《江州志》與《南康志》——對於輯錄佚書來說，《永樂大典》採用的宋元乃至明初方志，價值甚大，但四庫館臣鈔輯殊少，故後來不斷有人續成其事。至張忱石等人在2004年出版《永樂大典方志輯佚》一書，則已經輯錄了絕大多數存世《永樂大典》引述的古方志，其中也包括本冊《大典》中的一條《江州志》。不過，《永樂大典方志輯佚》沒有輯錄《永樂大典》在同一條目之下引述的《南康志》。這是因爲這條《江州志》係載錄女僊楊保宗“卻粒鍊形”事，而接下來在摘引《南康志》時僅述云：“‘南唐女僊楊保宗父母嘗以許人’云云同”，亦即《南康志》的紀事與《江州志》相同，而按照《永樂大典方志輯佚》的體例，凡“一志轉引他志，他志不單獨輯出列目”<sup>2</sup>，輯錄者大概是將《南康志》的內容，看成是對《江州志》的逐錄重寫，因此略而未錄。

(3)《燕語考異》——此《燕語考異》，實際上是指宋人葉夢得的《石林燕語》與宇文紹奕的《石林燕語考異》。《石林燕語》有明正德元年楊武刻本傳世，傅增湘稱“書中遇松本提行，從宋本出”，但此正德本未附宇文紹奕的《考異》<sup>3</sup>。《四庫全書》本合葉夢得《石林燕語》與宇文紹奕《考異》爲一書，《提要》題作“《石林燕語》十卷，《考異》一卷”，稱“一朝故事，得夢得之書而梗概具存，得紹奕之書，而考證益密”，並標註所依據的版本是“《永樂大典》本”<sup>4</sup>。本冊《永樂大典》引錄《燕語考異》一條<sup>5</sup>，經比勘知是葉夢得《石林燕語》本文，並未附有《考異》的內容<sup>6</sup>。

除去正德刻本和《四庫全書》本不論，此書在清代後期即通行有包含宇文紹奕《考異》在內的《琳琅秘室叢書》本，今天更有中華書局的點校本，其流行於世的普遍程度，甚至可用“有目共睹”來描述。《石林燕語》不僅常見易得，而且還是一部非常著名的書籍，四庫館臣稱譽“是書纂述舊聞，皆有關當時掌故，於官制科目，言之尤詳，頗足以補史傳之闕，與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徐度《卻掃編》可相表裏”<sup>7</sup>，故學者理當對其基本狀況有所了解。今沈氏將此書列入“今已湮沒之典籍”，應當是沒有弄清《燕語考異》即附綴於《石林燕語》之“考異”，從而詫爲世所未知的秘笈。

(4)《玉融新對》——儘管四庫館臣曾關注此書，並簽出待鈔，但《四庫全書》實際並未收錄此書，今亦未見傳本。檢弘治《八閩通志》記“陳若冲，字德用，以經學詞章為汪彥藻、柳彥質、李邴、趙鼎所知，自號樂全，所著有《藍溪集》。同縣人許拱辰，字元弼，亦以經學詞章聞，所著有《玉融新對》，莆田黃公度為序”<sup>8</sup>，萬曆時王圻著《文獻通考》，亦謂《玉融新對》一書爲“許拱辰著，辰字元弼，永福人，以經學詞章聞於鄉”<sup>9</sup>。因知《玉融新對》一書爲宋朝福建永福人許拱辰所著。

由此書世無傳本這一點來看，《永樂大典》引錄的佚文，似乎確有較大輯佚價值，不過本冊《永樂大典》引述的一條《玉融新對》佚文<sup>10</sup>，乃摘錄《高僧傳》卷三《曇摩密多傳》文<sup>11</sup>，實際上沒有什麼獨立的史料價值。

<sup>1</sup> 唐佚名《灌畦暇語》，頁8b—9a。

<sup>2</sup> 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新印《永樂大典》卷七七五六之“十九庚”形字之“卻粒鍊形”條，頁4a。馬蓉、陳抗、鍾文、樂貴明、張忱石《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北京，中華書局，2004）之《江州志·耆舊》，頁1689；又卷首張忱石撰《前言》，頁24。

<sup>3</sup> 傅增湘《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〇上《子部·雜家類·雜說》，頁82—83。

<sup>4</sup> 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子部·雜家類》“石林燕語”條，頁1040。

<sup>5</sup> 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新印《永樂大典》卷七七五六之“十九庚”形字“鍊氣服形”條，頁4b。

<sup>6</sup>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一〇，頁153—154。

<sup>7</sup> 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子部·雜家類》“石林燕語”條，頁1040。

<sup>8</sup> 明陳道《八閩通志》（明弘治刻本）卷六二《人物·文苑》，頁69b。

<sup>9</sup>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北京，現代出版社，1986，影印明萬曆刻本）卷一七九《經籍考·雜家》，頁2714。

<sup>10</sup> 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新印《永樂大典》卷七七五六之“十九庚”形字“迦毗羅見形”條，頁5a—5b。

<sup>11</sup> 梁釋慧皎《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三《宋上定林寺曇摩密多傳》，頁120—122。

(5)《有官龜鑑》——元蘇霖撰，《四庫全書》入子部雜家類存目，標明係據《永樂大典》本，編作十九卷<sup>1</sup>。此書今亦別無傳本。本冊《大典》引述《有官龜鑑》一條<sup>2</sup>，因檢書的館臣未能簽出抄錄，可補四庫輯本之闕。

(6)《蕭了真集》——此書名未見著錄。惟元代有道士蕭廷芝，字元瑞，號紫虛了真子。此紫虛了真子蕭廷芝，著有《金丹大成集》。明高儒《百川書志》著錄“《金丹大成集》五卷，紫虛子真予蕭庭芝元瑞編”<sup>3</sup>，其“子真予”自是“了真子”的譌變；又清初黃虞稷撰《千頃堂書目》亦載“蕭廷芝《金丹大成集》五卷，字元瑞”<sup>4</sup>。這種五卷本今有嘉靖四十二年刻本存世。然而《澹生堂藏書目》著錄此書作“紫虛《金丹大成集》一卷，《道書全集》本”<sup>5</sup>，《天一閣書目》則記有“《金丹大成集註》一卷，刊本。宋蕭廷芝撰。鶴林真逸彭耜、南岡逸叟童應卯俱有序”<sup>6</sup>，惟未詳此等一卷本與五卷本的內容是否相同。

蕭廷芝此書，今較為常見者，是影印《道藏》中元代以前道教丹經彙編《修真十書》所收錄的五卷本，即《修真十書》卷九至十三。本冊《永樂大典》僅僅引述的一條《蕭了真集》，乃謂“心中無心，念中無念，身入無形，與道為一”<sup>7</sup>，而這與《道藏》本蕭廷芝《金丹大成集》之《金液還丹論》篇末的一段文字竟完全相同<sup>8</sup>。又本冊《永樂大典》尚引述有一《大成集》云：“鍊形化氣，鍊氣化神，鍊神合道”<sup>9</sup>，而《金丹大成集》之《金丹答問》中亦有載有“問鍊形”語，答曰：“鍊形化氣，鍊氣化神，鍊神合道也。”<sup>10</sup>兩相比照，大致可以推斷，這冊《永樂大典》採錄的《蕭了真集》與《大成集》應當同為一書，都是蕭廷芝《金丹大成集》的簡略說法。明此可知，蕭廷芝此書之五卷全本，存世完好，《永樂大典》引述的所謂《蕭了真集》，並沒有任何輯佚的價值。

(7)《李方叔文集》——北宋人李廌撰。李廌文集傳世篇幅最多的版本，即《四庫全書》輯自《永樂大典》的《濟南集》寫本。四庫館臣稱其文集“南渡之初，已為罕覩。後遂散佚不傳。惟《蘇門六君子文粹》中載遺文一卷而已。《永樂大典》修於明初，其時原集尚存，所收頗夥。採掇編輯，十尚得其四五，蓋亦僅而得存矣”<sup>11</sup>。本冊《永樂大典》引述《李方叔集》祇有一條<sup>12</sup>，係摘錄文集中《奇正論》的內容，而不僅在《四庫》輯本中完整地錄有這篇《奇正論》的全文（題作《兵法奇正論》）<sup>13</sup>，而且《四庫》本所依據的陳亮《蘇門六君子文粹》，原本亦且完好無闕，《大典》中摘取的隻言片語，並不具備輯佚的功用。

(8)《群書足用》——此書未見著錄，亦未見傳本。審其書名，似為元代書坊編刻的類書。本冊《永樂大典》祇引述有一條佚文，書作：“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唐魏元忠命將用兵封事）。察羣材如用明鑑之形美惡，是美惡無逃於明鏡乎（唐元稹策）？”<sup>14</sup>雖然對於大多數研究來說，並沒有什麼獨立的史料價值，但確是可以供作輯佚之用。

(9)《江淮異人錄》——此書為北宋人吳淑撰。其單刻舊本，據著錄就有明嘉靖伍光忠

<sup>1</sup> 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一《子部·雜家類存目》“有官龜鑑”條，頁1117。

<sup>2</sup> 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新印《永樂大典》卷七七五六之“十九庚”形字“感德圖形”條，頁8a。

<sup>3</sup> 明高儒《百川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卷一一《子·神仙》，頁162。

<sup>4</sup>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卷一六《道家類》，頁439。

<sup>5</sup> 明祁承燾《澹生堂藏書目》（北京，中華書局，2006，《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清光緒間會稽徐氏刊《紹興先正遺書》本）卷八，頁217。

<sup>6</sup> 清范邦甸等《天一閣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三之二《子部·道家類》，頁321。

<sup>7</sup> 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新印《永樂大典》卷七七五六之“十九庚”形字“身入無形”條，頁10a。

<sup>8</sup> 《修真十書》（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影印正統《道藏》本）卷九元蕭廷芝《金丹大成集》，頁637。

<sup>9</sup> 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新印《永樂大典》卷七七五六之“十九庚”形字“守身鍊形”條，頁2b。

<sup>10</sup> 《修真十書》卷一〇元蕭廷芝《金丹大成集》，頁640。

<sup>11</sup> 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集部·別集類》“濟南集”條，頁1330—1331。

<sup>12</sup> 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新印《永樂大典》卷七七五六之“十九庚”形字“棋無定形”條，頁11a。

<sup>13</sup> 宋李廌《濟南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兵法奇正論》，頁1a—6a。

<sup>14</sup> 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新印《永樂大典》卷七七五六之“十九庚”形字“明鑑照形”條，頁11a。

刻本存世<sup>1</sup>。入清以後，此本復為錢塘鮑氏刊入《知不足齋叢書》，《知不足齋叢書》本來就很常見，而從民國至今，復不止一次影印流通，無論怎麼說，都是最平常人所習見之書，毫無稀僻罕密可言。又明正統《道藏》亦收有此書完本，清修《四庫藏書》時，因未見嘉靖刻本，復未能檢及《道藏》，祇好依據《永樂大典》，重新輯錄成書。此正統《道藏》原本學者確實難得一見，故葉德輝嘗作“三恨詩”，以不得讀《道藏》為人生三大憾事之一<sup>2</sup>，但現在它的影印本比《知不足齋叢書》還要多，因而也已經成為每一位學者隨時可以取閱的書籍，初不待目錄學專家指引，沈氏何以竟謂其書是“今已湮沒之典籍”？

對於《江淮異人錄》一書，還有一些情況，順便在此稍加說明。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此書，作“《江淮異人錄》二卷，吳淑撰。所紀道流、俠客、術士之類，凡二十五人”<sup>3</sup>。清四庫館臣稱“其書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中掇拾編次，適得二十五人之數，首尾全備，仍為完書。謹依《宋志》，仍分為上、下二卷，以復其舊焉”<sup>4</sup>。實際比勘傳世文本與四庫輯本，可以看到，這個輯本的內容，雖然與傳世原本相差不是特別懸殊，但仍有明顯不同。

例如，在四庫輯本載錄的二十五個人當中，“凡唐代二人，南唐二十三人”<sup>5</sup>，這兩個唐代的人物，一為“唐寧王”，一是“花姑”。其“唐寧王”條記云：“寧王善畫馬，花萼樓壁畫六馬滾塵圖，明皇最愛玉面花驄，後失之，止存五馬。”“花姑”條記云：“宋單父有種藝術，牡丹變易千種。明皇召至驪山，種花萬本，色樣不同，呼為‘花姑’。”四庫館臣附有案語云：“是書所載，皆南唐人事，獨此二條為唐明皇時，考之宋元以後諸書，所引用皆同。今仍其舊列于卷首。”<sup>6</sup>如同四庫館臣所指出的那樣：“徐鉉嘗積二十年之力，成《稽神錄》一書，淑為鉉壻，殆耳濡目染，挹其流波，故亦喜語怪歟？鉉書說鬼率誕漫不經，淑書所記則《周禮》所謂‘怪民’、《史記》所謂‘方士’，前史往往見之，尚為事之所有。其中如耿先生之類，馬令、陸游二《南唐書》皆採取之，則亦非盡鑿空也。”<sup>7</sup>檢徐鉉《稽神錄》，所記皆五代間神怪故事，吳淑既是“挹其流波”，應該同樣是以五代這一時期作為其編錄的時間範圍，故四庫館臣對發生在唐朝的“唐寧王”、“花姑”這兩個故事有所疑慮，應該是很合理的想法。

今案宋人曾慥的《類說》，收錄有一《異人錄》，多隋唐奇人詭行，其中即包括上述“唐寧王”、“花姑”兩事（惟“花姑”書作“花師”，略有不同，揆諸文義，似以作“花師”為是）<sup>8</sup>，但也有與《江淮異人錄》相同的條目。疑二者有部份內容當出自同一淵源，而《四庫》輯本誤將《異人錄》中“唐寧王”和“花師”（花姑）兩條混淆為《江淮異人錄》的內容<sup>9</sup>。

(10)《內翰談苑》——《文淵閣書目》著錄有“《內翰談苑》一部一冊闕”<sup>10</sup>，應即當初編纂《永樂大典》時所依據的本子。

<sup>1</sup> 傅增湘《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一上《子部·小說家類·異聞》，頁83。

<sup>2</sup> 葉德輝《書林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57）卷八“明以來之刻本希見”條，頁229。

<sup>3</sup>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五《偽史類》，頁135。

<sup>4</sup> 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二《子部·小說家類》“江淮異人錄”條，頁1211—1212。

<sup>5</sup> 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二《子部·小說家類》“江淮異人錄”條，頁1211。

<sup>6</sup> 見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江淮異人錄》卷上之“唐寧王”條、“花姑”條，頁1a—1b。

<sup>7</sup> 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二《子部·小說家類》“江淮異人錄”條，頁1211。

<sup>8</sup> 宋曾慥《類說》（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明天啓六年岳鍾秀刻本）卷一二《異人錄》，頁213—217。

<sup>9</sup> 案清人鮑廷博在將明嘉靖伍光忠刻本《江淮異人錄》刊入《知不足齋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9，縮印民國二十二年上海古書流通處影印鮑氏家藏初印本）時，嘗附有跋語（頁557）云：“是錄明嘉靖中伍光忠本，稍加潤色，尚未失真。近刻首列明皇游月宮事，展卷即知其偽矣。”實則此“明皇游月宮”事即見於《類說》所收《異人錄》，故同樣不是簡單的偽制贗造問題。

<sup>10</sup> 明楊士奇等編《文淵閣書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國學基本叢書》本）卷一一《盈字號第六廚書目·醫書》，頁147。

此書《四庫全書》未著錄。檢《郡齋讀書志》載有“《楊文公談苑》八卷”，為“皇朝宋庠編。初楊公億里人黃鑑，哀撰平生異事為一編，庠取而刪類之，分為二十一門”<sup>1</sup>。《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此書，則徒以《談苑》為名，卷次分為十五，謂其書乃“丞相宋庠公序所錄楊文公億言論。初，文公里人黃鑑從公遊，纂其異聞奇說，名《南陽談藪》，宋公刪其重複，分為二十一門，改曰《談苑》”<sup>2</sup>。相互對比可知，《郡齋讀書志》所說黃鑑“哀撰平生異事為一編”的說法，不夠清晰，黃鑑所哀輯者乃楊億講述的異聞奇說。民國上海涵芬樓印原本《說郛》，收有此書片斷，題《楊文公談苑》，首錄宋庠序文，述云楊億於文辭之外，“其博物殫見，又過人遠甚，故當時與其遊者，輒獲異聞奇說，門生故人，往往削牘藏弄，以為談助。江夏黃鑑唐卿者，文公之里人，有俊才，為公所重，幼在外舍，逮乎成立。故唐卿所纂，比諸公為多，但雜抄廣記，交錯無次序，好事者相與名曰‘談藪’。予因而掇去重複，分為二十一目，勒成一十五卷，輒改題曰‘楊公談苑’”<sup>3</sup>。因楊億嘗為翰林學士，故依時人慣例，亦可以“內翰”稱之<sup>4</sup>。宋人高承講述“次韻”詩的緣起，引述《談苑》的說法，謂宋真宗時“楊內翰億”謂次韻詩始自唐朝元、白之輩<sup>5</sup>，從而可知所謂《內翰談苑》與《楊文公談苑》應當同為一書。

《楊文公談苑》世上久已不存完本，僅賴《說郛》本傳其寥寥數則。今本冊《大典》引述《內翰談苑》一條，乃謂此書之“惡戒篇”記“相者田辨，謂王延範曰：‘君是坐天王形，頻伽眼，仙人鼻，雌龍耳，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人。後坐謀不軌，棄市’”<sup>6</sup>。檢涵芬樓本與宛委山堂本《說郛》本《楊文公談苑》俱未載錄此事，知這條引文誠可供以輯錄楊億此書佚文。

(11)《三境圖論》——此書《四庫全書》未收。檢元人楊維禎曾寫有一篇《三境圖論序》，全文如下：

余讀經子九流之書，恨有未盡，而身毒國之書，鞮譯于不可諾者，固有未暇。杭之淨性寺主僧無為師，觴余東塔院，談出世法。初聞其說娑內蘇迷盧外為七金，水為四州，東為弗菩提，南為閻浮提，西為瞿耶尼，北為鬱單越，地各袤數十萬由旬。又曰持地山外為香山、雪山、寶山，山上有馳，名阿耨達，東北山水至積石山，潛流地下，為黃河之源。以吾聖元幅員之廣，西極河源，東盡震旦，窮步章水不能萬由旬，而此日月世界不知在鬱單越耶？閻浮提耶？又曰日琉璃寶（德勇案：疑此處脫一“城”或“宮”字）廣二千四百有餘里，天子天民居之；月宮水晶寶城，其廣如日，天后天女居之。不知二千四百有餘里宮城之內，誠有陰陽晝夜乎？有，則又孰為之日月乎？又曰念根者，性之原，即命也。人天性、地獄性，一念別爾。彈指頃見三十二億百千念，念念成形，形（德勇案：疑此處脫一“形”字）有識。以吾天命之性，未嘗有地獄，不知一念為人天、為地獄，可為性原乎？又曰牆壁瓦礫具有佛性，瓦礫又有念念不乎？又曰千物出後世卻乃壤，天地生滅，在菩薩一吹唾中，未知菩薩之力有吹而成，孰與不唾不滅，使之為無唾滅耶？而又使之不能不滅於十二萬，斯之後何也？余時未辯所言，即嘿嘿別去。

明日，師復謁余邸次，出所著《三境圖論》，其論所演不出所言者，其圖又曰因境生象，因象生見、生想、生道。余為披圖誦書，蓋有不得其續。師且過索余言為引重。余孔子徒也，言不相謀，得非云者。有非其徒所能決，回必將決於言不相謀者邪？夫苟合

<sup>1</sup> 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北京，現代出版社，1987，《中國歷代書目叢刊》影印宋淳祐袁州刻本）卷三下《小說類》，頁955。

<sup>2</sup>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小說家類》，頁325。

<sup>3</sup> 明陶宗儀《說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說郛三種》影印民國涵芬樓編印明鈔原本）卷二一《楊文公談苑》，頁380。

<sup>4</sup> 宋高承《事物紀原》（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四《法從清望部》之“內翰”條，頁221。

<sup>5</sup> 宋高承《事物紀原》卷四《經籍藝文部》之“次韻”條，頁191。

<sup>6</sup> 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新印《永樂大典》卷七五五六之“十九庚”形字“坐天王形”條，頁13a。

卦體於入佛之道者，《易》之罪人也。故余爲錄其言，以啟折中者，引于卷之端，非苟合也。抑余聞中土三寶有象，四十二有章，實身迦景摩騰、竺法蘭始，今三境有章又自師始也。貪佛者欲不爭傳競習而得乎？嘻，使三境者誠灼灼不誣，其罔諸法、度羣想，出大允而優入乎四聖之域者，當無勝矣。則是書非台祖之宗子、外道之金城、四十二章之羽翼驂乘歟？師名並學，自號無爲子，台盤石人。脫白于杭之芝阜，受天台旨于知先，今主淨性寺云。<sup>1</sup>

楊維禎堅定地維護儒家的思想觀念，對《三境圖論》宣講的佛法完全沒有興趣，所以這篇序寫得很勉強。正因為如此，與“無爲子”的書相比，楊維禎這篇序文也許更有特色，很值得一讀。

閱讀楊維禎此序，使我們得以清楚瞭解《三境圖論》一書的作者、時代及其性質和內容。本冊《大典》引述《三境圖論》祇有如下的一條：“古修仙鄧真君者，道滿出山，路逢不孝子毆其母，一念不平，手擊口咬逆子至死。真君即變爲鳥頭鷹嘴，令居雷部。嗟乎，得道之人，嗔不孝者，尚變惡形，況未修道及爲己私嗔恨忿乎？”<sup>2</sup>如同前述宋許拱辰著《玉融新對》一樣，儘管四庫館臣曾擬輯錄此書，但在《四庫全書》中實際並沒有收錄。另一方面，此“無爲子”著《三境圖論》也沒有被收入《大藏經》中，今亦未見其他傳本。因此，本冊《永樂大典》引錄的這條佚文，對重輯此書，確實會有用處。

(12)《史樂書》——本冊《永樂大典》引述所謂《史樂書》一條，乃云：“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影之象形。”<sup>3</sup>若是簡單地把“史樂書”三字視作實際的書名，那麼，確如沈津所說，這很像是一部“湮沒之典籍”。

然而，徒以一“史”字來簡稱太史公書，是古人非常通行的做法，所以，閱讀古書具有一定經歷的學者，在遇到像這樣的稱謂的時候，首先應當考慮，它是不是指《史記》當中的《樂書》。事實上，《永樂大典》引述《史記》諸書，對其書名，通常都是但稱一個“史”字，然後再綴加篇名，如《史河渠書》<sup>4</sup>、《史律書》<sup>5</sup>。檢《史記·樂書》，正有記載云：“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sup>6</sup>“景”與“影”祇是古今字體的差別而已，實質上完全相同，《永樂大典》引述的《史樂書》顯然就是錄自《史記·樂書》。除此之外，世上並不存在有待輯佚的“史樂書”一書。

(13)《經學明訓》——《文淵閣書目》著錄有“《經學明訓》一部一冊完全”<sup>7</sup>，當即纂修《永樂大典》時所用底本。至萬曆年間明張萱等重新點檢文淵閣藏書，編纂《內閣藏書目錄》，仍著錄有此“《經學明訓》一冊全”，惟孫能傳、張萱等增列附注云：“即程若庸《字訓》正文。”<sup>8</sup>此程若庸《字訓》，自蒙元以來歷經明清兩朝，有多種刻本傳世，清修《四庫全書》被列入“存目”之中，今《四庫存目叢書》據清同治刻《西京清麓叢書》本影印，更至爲常見。

《四庫提要》謂此書“舊本題宋程端蒙撰，程若庸補輯。端蒙字正思，德興人，淳熙七年鄉貢，補太學生。若庸字達原，休寧人，咸淳四年進士，嘗充武夷書院山長。端蒙所作凡三十條，若庸廣之，為‘造化’、‘性情’、‘學力’、‘善惡’、‘成德’、‘治道’六門，凡百八

<sup>1</sup>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4）卷一三〇三楊維禎《三境圖論序》，頁293—294。

<sup>2</sup> 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新印《永樂大典》卷七七五六之“十九庚”形字“真君變形”條，頁13a。

<sup>3</sup> 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新印《永樂大典》卷七七五六之“十九庚”形字“影象形”條，頁13a。

<sup>4</sup> 明官修《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1986，單色影印本）卷二二六〇之“六模”湖字“五湖”條，頁727。

<sup>5</sup> 明官修《永樂大典》卷二〇三〇九之“二質”乙字“甲乙”條，頁7593。

<sup>6</sup>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二四《樂書》，頁1459。

<sup>7</sup> 明楊士奇等編《文淵閣書目》卷四《黃字號第二廚書目·性理》，頁51。

<sup>8</sup> 明孫能傳、張萱等編《內閣藏書目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民國烏程張氏刊《適園叢書》本）卷八《雜部》，頁432。

十三條，門目糾紛，極為冗雜。明初朱升，又增‘善字’一條，摭袁甫之說以補之。其為一百八十四條，皆以四字為句，規仿李瀚《蒙求》而不諧聲韻，不但多棘唇吻，且亦自古無此體裁。疑端蒙游朱子之門，未必陋至於此，或村塾學究所託名也”<sup>1</sup>。不管作者究竟屬誰，此書今仍完好存世，本冊《永樂大典》僅引述《經學明訓》一條，云“至誠盡性，充其形色，是曰踐形”<sup>2</sup>，今查覈程氏《性理字義》，文字正完全相同<sup>3</sup>，因知《大典》本絕無輯佚作用可言。

(14)《唐鱣》——《文淵閣書目》著錄有“池詠《唐鱣》一部一冊闕”<sup>4</sup>，看起來《永樂大典》引述的《唐鱣》似乎即出自此書。不過“池詠”其人，別無所見，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之趙希弁《附志》著錄有“《唐鱣》五十卷”，趙氏云此書係“張文忠公九成所著也。公嘗謂紀、志出於歐陽公，列傳出於宋公，《天文》、《律曆》、《五行志》則劉義叟為之，《方鎮》、《百官表》則梅堯臣為之，《禮儀》、《兵制》出於王景彝，未竟而卒。每患首尾不相貫屬，遂總其條綱，稽其同異，類聚而區別之”<sup>5</sup>。據此，則宋人張九成亦著有一《唐鱣》。本冊《永樂大典》引述的一條《唐鱣》記云：“孟郊字東野，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和，韓愈一見為忘形交。”<sup>6</sup>這樣的內容倒是與張九成的《唐鱣》相吻合。

從《文淵閣書目》所記“池詠”《唐鱣》篇幅僅有一冊的情況來看，其與張九成之五十卷本《唐鱣》顯然不可能是同一種書籍。祇是《文淵閣書目》著錄的這部《唐鱣》，是列在所謂“史雜”書籍當中，而且同時著錄這位“池詠”還另有一部《漢鱣》，也是“一部一冊”<sup>7</sup>，顯然是與《唐鱣》同樣性質的史部書籍。疑池詠此書是用張九成書簡化而成，同時還另編了一部同樣體裁的《漢鱣》。

不管作者的情況究竟如何，《唐鱣》一書，確是久已失傳，《永樂大典》的引文，總能幫助我們瞭解此書的一些基本狀況。

(15)《四書章圖》——此書《四庫全書》未收，為元人程復心撰著。今有元後至元三年吳氏德新堂刊本傳世，過去森立之在《經籍訪古志》中即曾有過著錄<sup>8</sup>。其完本僅見於日本內閣文庫，另外還有幾部殘本分藏於中外各地。據日本內閣文庫藏全本，知全書共二十二卷，其中有上、中、下三卷為“四書章圖隱括總要”，繼之為《大學句問章圖纂釋》一卷、《中庸句問章圖纂釋》一卷、《論語注問章圖纂釋》十卷、《孟子注問章圖纂釋》七卷<sup>9</sup>。朱彝尊在康熙年間著《經義考》時，尚得見二十二卷全本，故著錄為存世著述<sup>10</sup>。而稍後全祖望則特地稱道“《永樂大典》載此書”<sup>11</sup>，說明已經難得一見。儘管傳本無多，畢竟仍有全書存世，其不待依賴《永樂大典》來重新輯錄，自是顯而易見的事情。

(16)《僧文珣集》——此書即宋元間僧人文珣的詩集，四庫館臣稱“是集之佚，其來已久，今從《永樂大典》哀輯，得詩尚近九百首。宋元以前僧詩之工且富者，莫或過之”<sup>12</sup>。

<sup>1</sup> 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五《子部·儒家類存目》“性理字訓”條，頁805。

<sup>2</sup> 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新印《永樂大典》卷七七五六之“十九庚”形字“踐形”條，頁20a。

<sup>3</sup> 宋程端蒙原著、程若庸補輯《程庸齋增廣性理字訓·成德》（清同治十二年刻《西京清麓叢書》本），頁13a。

<sup>4</sup> 明楊士奇等編《文淵閣書目》卷六《宙字號第二廚書目·史雜》，頁76。

<sup>5</sup> 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之趙希弁《附志》卷五上《類書類》，頁1043。

<sup>6</sup> 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新印《永樂大典》卷七七五六之“十九庚”形字“忘形”條，頁21a。

<sup>7</sup> 明楊士奇等編《文淵閣書目》卷六《宙字號第二廚書目·史雜》，頁76。

<sup>8</sup> 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北京，中國書店，1990，《海王邨古籍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清光緒十一年徐承祖鉛印本）卷二《四書類》，頁32—33。

<sup>9</sup> 嚴紹璽《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之《經部·四書類》“四書章圖纂釋”條，頁216—217。

<sup>10</sup> 清朱彝尊《經義考》（北京，中華書局，1998，影印民國《四部備要》本）卷二五五《四書》四，頁1283—1285。

<sup>11</sup>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清嘉慶姚江借樹山房刻本）卷二七《題程復心四書章圖》，頁17b。

<sup>12</sup> 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集部·別集類》“潛山集”條，頁1406。



除此《四庫》輯本之外，此書別無傳本。

本冊《大典》引述文珣《寓形》詩一首，詠曰：“寓形宇宙間，治身猶治木。要在直而方，母（毋）使圓且曲。直方固違衆，吾心以為是。圓曲雖適時，吾心以為恥。人由圓曲富，吾用直方貧。吾心雖不移，予以書諸紳。”<sup>1</sup>此詩見於四庫輯本《潛山集》卷四<sup>2</sup>，二者之間，文字完全相同，就連字形寫得不夠準確的“母”字（德勇案：應正作“毋”）都完全相同。不過，能夠印證《四庫全書》輯本的準確性，並保留其原始存在形式，也是一種不容忽視的文獻價值。

(17)《太玄寶典》——此書撰人不詳，為道教內丹典籍，分上、中、下三卷，正統《道藏》收有全文。本冊《大典》引述《太玄寶典》之《天地配形章》與《輶形晦跡章》兩章<sup>3</sup>，俱見於正統《道藏》本卷上之《修真沖寂門》中<sup>4</sup>。本冊《永樂大典》引述的這兩章內容，不僅沒有輯佚的價值，而且在校勘上，也沒有什麼作用。

事實上，兩相比較，《永樂大典》的引文，還有很多譌誤，文字遠不及《道藏》本精善。例如，其《天地配形章》一條，較諸《道藏》本脫漏“真人導氣，自丹田上行”句中的“氣”字，還脫漏“天地交媾”句的“媾”字。又如《道藏》本《太玄寶典》之《輶形晦跡章》文曰：

天地賦形氣，生則居世絕俗愛，死則脫殼斷塵緣。生則滅形藏於影，死則集神構於真。皆有法焉。形滅後者，冬至日日初出，向日行，登東方山，大松下，手提赤芝，必有鬼物相迎。呼天狼七遍，其鬼必自身後收黑氣，走向覆身。此則陰消而無影，神鬼不可犯之。死則集神，神不散，構精不移也。

文中“居世”，《大典》引文譌作“居生”；“生則滅形”，《大典》引文脫“則”字；“走向覆身”，《大典》引文作“向西自一”，雖然《道藏》本的文字也不夠順暢，但《大典》引文顯然脫落“走”字，而“西”字係“覆”之殘損，“自一”是“身”字的譌變；又《大典》本引文還脫漏“構精不移”的“構”字。由此看來，本冊《永樂大典》引錄的《太玄寶典》，其史料價值，可謂近乎為零。

(18) 姬知常《雲山集》——此書《四庫全書》未收，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注》謂乃“知常真人姬志真集，集中詩賦歌論、碑記雜文，大率以演暢真風灑滌塵累為主”<sup>5</sup>，知係元朝道士姬志真號知常真人者詩文集。今《道藏》中收此書編作八卷，本冊《永樂大典》引述《雲山集》一條，題作“宋姬知常《雲山集》”，所說朝代，有明顯譌誤。

本冊《永樂大典》引錄《雲山集》詩六首，分別為《形苦》、《形幻》、《委形》、《形微》、《幻形》、《形昧》<sup>6</sup>，除《形苦》一首似乎未見之外，其餘五首都在《道藏》本內，而且文字沒有明顯差別<sup>7</sup>。如果一定要對比一下文字優劣的話，則是《永樂大典》的引文存在明顯譌誤。如《形幻》詩有句云“莫為空幻具，還作真箇囚”，“真箇”《大典》引錄即譌作“真固”。

<sup>1</sup> 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新印《永樂大典》卷七七五七之“十九庚”形字“詩文”條，頁14a。

<sup>2</sup> 宋釋文珣《潛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寓形》，頁3b。

<sup>3</sup> 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新印《永樂大典》卷七七五七之“十九庚”形字“天地配形章”條與“輶形晦跡章”條，頁29b。

<sup>4</sup> 《太玄寶典》（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影印正統《道藏》本）卷上《修真沖寂門》，頁871，頁873。

<sup>5</sup> 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影印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卷四，頁51—52。

<sup>6</sup> 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新印《永樂大典》卷七七五七之“十九庚”形字“詩文”條，頁13b—14a。

<sup>7</sup> 元姬志真《雲山集》（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影印正統《道藏》本）卷一《形幻》，頁367；又卷二《形昧》，頁373；卷三《委形》、《形微》，頁381—382，頁388；卷四《幻形》，頁392。

(19) 吳筠《步虛詞》——唐吳筠著《宗玄集》，《四庫全書》著錄，《道藏》亦收錄有此書，此外還有宋刻本傳世<sup>1</sup>。此《宗玄集》內有《步虛詞》十首，本冊《永樂大典》摘錄“吳筠《步虛詞》”一句云“鍊形爲真僊”<sup>2</sup>，見其中第四首，全句爲“稟化凝正氣，鍊形爲真仙”，文字沒有實質性出入<sup>3</sup>。從而可知《永樂大典》引錄的這一詩句，不僅沒有輯佚的功用，甚至連校勘價值也不具備。

(20) 陳纂《葆光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葆光錄》三卷，陳纂撰。自號‘襲明子’，所載多吳越事，當是國初人”<sup>4</sup>。今通行有《顧氏文房小說》本，且被收入《筆記小說大觀》和《叢書集成初編》，近年還有傅璇琮等編《五代史書彙編》校印本，至爲習見，“湮沒”之說，根本無從談起。本冊《永樂大典》引錄陳纂《葆光錄》一條，記“湖州高彥司徒夢見一道士仗劍至臥內”云云，文見傳世本卷三<sup>5</sup>，沒有什麼特別的輯佚價值。

(21) 唐《柳常侍言旨》——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此書，作“《常侍言旨》一卷”，乃“唐柳理記其世父登所著六章，上清、劉幽求二傳附”<sup>6</sup>；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書作“《柳常侍言旨》一卷。唐柳理撰。常侍者是，其世父芳也。凡六章，未有劉幽求及上清傳”，清人盧文弨已經指出，柳理世父之名，當從晁公武《讀書志》作“柳登”<sup>7</sup>。明《文淵閣書目》著錄有“《常侍言旨》一部一冊闕”<sup>8</sup>，當時或尚有單行本流傳，至清乾隆時纂修《四庫全書》則已稱“此書無別行之本”而僅見於“陶宗儀《說郛》所載”<sup>9</sup>，因《四庫全書》已據順治宛委山堂本收入《說郛》，故再未單獨著錄此書。

本冊《永樂大典》引錄《唐柳常侍言旨》一條，謂“顏魯公嘗於至人處求得名藥服之，及懸車之年，氣力壯健，如三四十人。奉使李希烈，至蔡州，責希烈反逆無狀，賊遣臣豎縊之。蔡帥陳仙奇，奉魯公喪歸京師。猶子顏峴啓棺，瞋目如生，兩手拳握，十指掐掌，爪出手背，肌體完全，悉無敗壞。時隱士唐若山聞之，曰：‘道流中以形全爲上，氣全次之。顏公能全其形，此後三二十年，縱藏於鐵石中，必能擘裂飛騰而去，被羽衣喪於山門間，所謂地僊也’”<sup>10</sup>。檢《說郛》之涵芬樓本與宛委山堂本，其所列《常侍言旨》篇幅寥寥，俱未載錄此條<sup>11</sup>，知固可供補輯《常侍言旨》，爲好道顏魯公軼事者增添新的談資。

(22) 宋薛季宣《浪語集》——薛季宣是宋代浙東永嘉學派的代表性人物，在學術史上，聲名卓著。他的這部文集，最初是在宋理宗寶慶二年八月，由其侄孫師旦、師石兄弟共同編纂，刊刻行世<sup>12</sup>。然而，由於永嘉學派所宣揚的思想觀念與後來成爲官方主流意識的朱子學說頗有違異，故爲世所輕，以致薛氏此集“自明以來，刻本遂絕”<sup>13</sup>。明代以及清代晚期以前各地著名藏書家所著錄的傳本，凡明確標注版本者，如明末祁氏澹生堂藏本<sup>14</sup>、清代瞿氏鐵琴銅劍樓<sup>1</sup>，都是只有源自宋刻的抄本；甚至清乾隆時官修《四庫全書》，

<sup>1</sup> 傅增湘《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上《集部·別集類》，頁108—109。

<sup>2</sup> 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新印《永樂大典》卷七七五六之“十九庚”形字“守身鍊形”條，頁3a。

<sup>3</sup> 唐吳筠《宗玄先生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影印正統《道藏》本）卷中《步虛詞》，頁666。

<sup>4</sup>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小說家類》，頁339。

<sup>5</sup> 宋陳纂《葆光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2000，《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明正德嘉靖間原刻《顧氏文房小說》本）卷三，頁381。

<sup>6</sup> 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三下《小說類》，頁953。

<sup>7</sup>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小說家類》並附清盧文弨校語，頁319。

<sup>8</sup> 明楊士奇等編《文淵閣書目》卷六《宙字號第二廚書目·史雜》，頁78。

<sup>9</sup> 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子部·小說家類》“次柳氏舊聞”條，頁1183。

<sup>10</sup> 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新印《永樂大典》卷七七五六之“十九庚”形字“死後全形”條，頁6a—6b。

<sup>11</sup> 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說郛三種》本影印民國涵芬樓編印明鈔原本《說郛》之卷五唐柳理《常侍言旨》，頁96—97；又同時影印清順治宛委山堂刻本《說郛》之四九唐柳理《常侍言旨》，頁2265—22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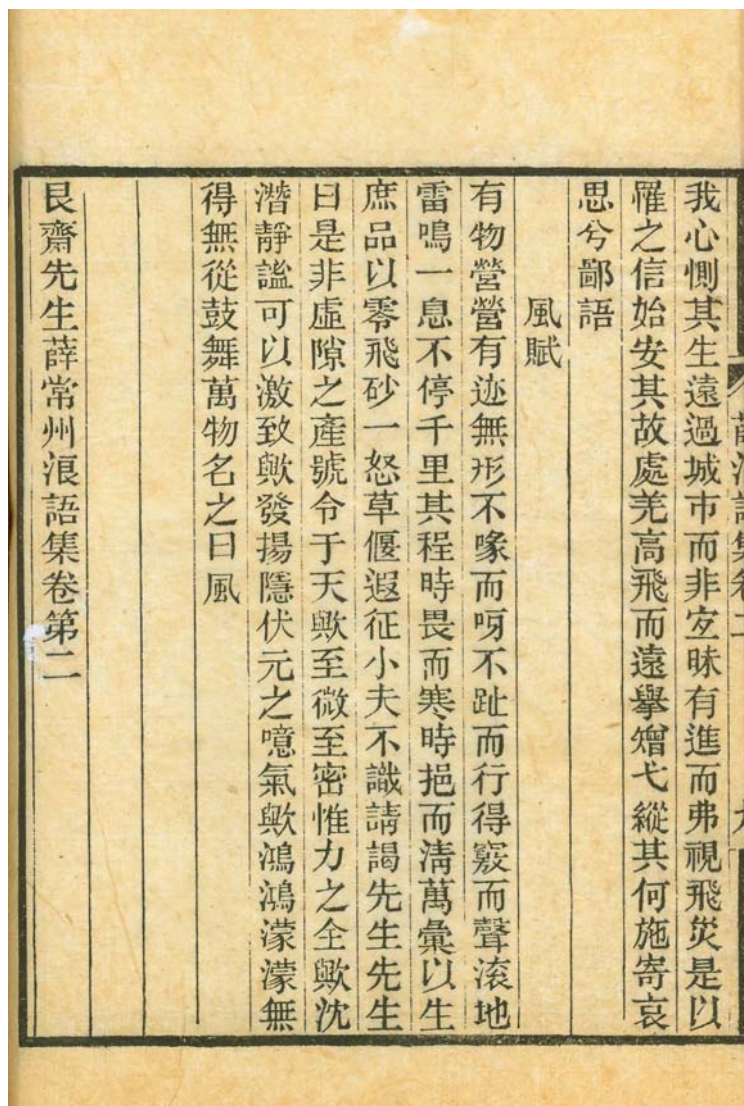
<sup>12</sup> 宋薛季宣《浪語集》（清同治辛未壬申間金陵書局刻初印本）卷末薛師旦撰後序，頁32。

<sup>13</sup> 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集部·別集類》“浪語集”條，頁1379—1380。

<sup>14</sup>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清光緒辛丑錢塘丁氏刻本）卷三〇《集部》“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條，頁759。

多方搜求公私藏書，也只能找到所謂“兩淮馬裕家藏”的一部傳抄本，用作著錄的底本<sup>2</sup>。

即使是這一類抄錄本，亦往往殘缺不全。如祁氏澹生堂收藏的明代抄本，原書三十五卷，也只存有三十四卷<sup>3</sup>，後來這部書傳入丁氏善本書室時，則僅剩有三十卷，又有四卷在流傳過程中毀失不存<sup>4</sup>。然而，各大藏書家卻依舊珍重存儲，其書在世間流通之甚少，可想而知。這在像薛季宣這樣著名的學者的詩文集當中，是十分少見的特例。



清同治辛未壬申間金陵書局刻初印本《浪語集》

明代以來的鈔本雖然至今仍罕密難睹，但不僅《四庫全書》中收有此書，而且在清同治十年（辛未）至十一年（壬申）間，尚由孫衣言、孫詒讓出面，在金陵書局將其刊印行世<sup>5</sup>。

<sup>1</sup> 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北京，中華書局，1990，《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影印清光緒刻本）卷二一《集部·別集類》“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條，頁326。

<sup>2</sup> 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集部·別集類》“浪語集”條，頁1379—1380。

<sup>3</sup> 明祁承燾《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集類·別集》，頁267。案清邵懿辰撰、邵章續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一六《集部》“浪語集”條下（頁743）附錄孫詒讓注語，謂“祁本兵燹後散失，僅存三冊，可惜也”。

<sup>4</sup>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集部》“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條，頁759。

<sup>5</sup> 宋薛季宣《浪語集》卷首題清孫衣言撰刻書序言，頁2a。清邵懿辰撰、邵章續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集部》“浪語集”條下（頁743）附錄有孫詒讓注語，云乃父衣言“命詒讓合諸抄本校刊”。

金陵書局版刻事竣之後，刷印無多，故此金陵書局印本今亦稀見難求。不過，孫衣言後將書版攜歸溫州故里，以之匯印入所輯錄溫州鄉邦文獻匯刊《永嘉叢書》<sup>1</sup>。至此，《浪語集》已經在世間廣泛流行，今稍具規模的圖書館即有收藏，略讀古書者當即知悉其人其書，更不用說像哈佛燕京這樣著名的漢籍收藏單位以及像沈津這樣的版本目錄專業從業人員，不知沈氏何以竟謂薛氏《浪語集》為“今已湮沒之典籍”？

本冊《永樂大典》共引錄有四條《浪語集》的內容，分別標作《風賦》、《蛆賦》、《風陣讚》和《奇兵讚》<sup>2</sup>，俱見於同治金陵書局刻本<sup>3</sup>。惟《風陣讚》和《奇兵讚》本來是薛氏“詮定”的所謂《風后握奇經》的一部份，既非獨立的篇目，更不屬於薛季宣本人撰寫的著述。今檢《文淵閣書目》，雖然沒有載錄薛氏此書，但在孫能傳、張萱等人編纂的《內閣藏書目錄》中，卻記有“《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十冊，不全。宋乾道間薛季宣著，闕二冊”<sup>4</sup>。疑正統年間楊士奇等點檢內閣藏書時因“徒草率以塞責”<sup>5</sup>，以致有所遺漏，至萬曆時孫能傳、張萱等重新查驗造冊，始記入此書，其較諸明初所藏，已經失去兩冊，而《永樂大典》編纂時所依據的版本，則很可能是首尾完好的宋刻原本。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就我目前所查覈的情況來看，在沈津舉述的二十三種書籍當中，祇有《江州志》、《南康志》、《玉融新對》、《群書足用》、《內翰談苑》、《三境圖論》、《唐鱸》和唐《柳常侍言旨》這八種，大體可以稱得上是“今已湮沒之典籍”，明顯具有輯佚價值（其中的《江州志》還早已被輯出利用，在這裏亦可略而不談）。另外，《有官龜鑑》一書雖有《四庫》輯本，但本冊《永樂大典》引述的佚文，為四庫館臣所遺漏未輯，也有補闕的價值（我平日讀書無多，且檢索未周，進一步仔細勘比，在這當中或許還會有一些書籍，並不具有輯佚的價值）。至於沈氏文中列舉的其他那些書籍，不僅絕無“湮沒”之虞，而且有很多還十分常見，甚至包括像《史記》、《石林燕語》、《浪語集》這樣一些人所共知的基本典籍，足見沈津所說與這些文獻的實際存在狀況，相去甚遠，讀者萬萬不可輕信。在利用這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這兩冊《永樂大典》時，最好還是自己動手，從頭一一查覈。

辨明沈津文章的嚴重謬誤，祇能令讀者更好地利用《永樂大典》來做研究，絲毫不會減低這兩冊《永樂大典》的史料價值。即以輯佚而論，除了上述《玉融新對》、《群書足用》、《內翰談苑》、《三境圖論》、《唐鱸》和唐《柳常侍言旨》等書之外，還有很多。如四庫館臣已經簽出的《敬齋泛說》，本與《敬齋古今註》一樣，都是元人李治的著作<sup>6</sup>。四庫館臣評議《敬齋古今註》，謂“此書專為考訂而作，取載籍疑義，一一詳辨”，四庫館臣並稱譽李治云：“其記問淹通於千古，沿譌習謬之故實，能夠深索隱，而洞見其所以然。”又謂其說經論史，兼及於子，乃至評鑑詩文，見識之精審，“在宋元說部中，典核可比孫毅、王觀國，博瞻可比洪邁、王應麟，其他實未有能過之者”。惟其書原本流傳極為罕見，清之文臣也是從《永樂大典》中輯得佚文八卷（比較接近原本面貌的本子，直到清末，始由繆荃孫刊入《藕香零拾》叢書，以供流通）<sup>7</sup>。可是，《永樂大典》中原來同樣擬議輯錄的《敬齋泛說》，實

<sup>1</sup> 清孫詒讓《籀廬述林》（民國五年刻本）卷四《艮齋浪語集敘》，頁11。案此文系孫詒讓代乃父孫衣言作，初刊印于金陵書局刻本《浪語集》卷首。

<sup>2</sup> 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新印《永樂大典》卷七五五六之“十九庚”形字“有迹無形”條，頁10a；又“風無正形”條、“兵體無形”條，頁11a；“啣咀之形”條，頁12b。

<sup>3</sup> 宋薛季宣《浪語集》卷二《胆賦》、《風賦》，頁8a—9b；卷三〇《風后握奇經》，頁4a—4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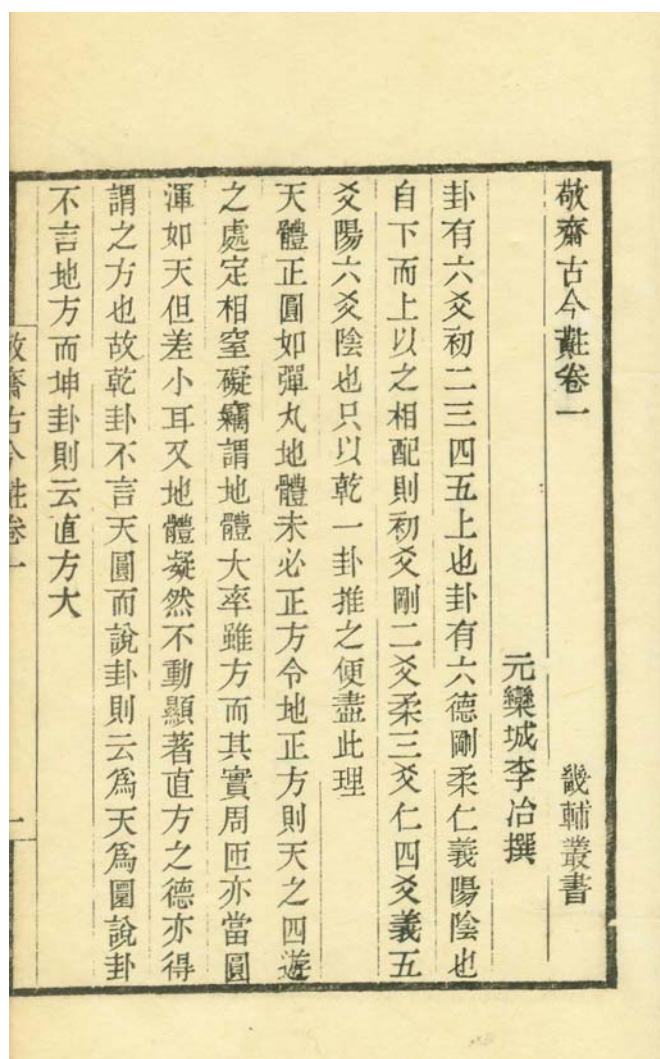
<sup>4</sup> 明孫能傳、張萱等纂《內閣藏書目錄》卷三《集部》，頁336。

<sup>5</sup> 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五《史部·目錄類》“文淵閣書目”條，頁731。

<sup>6</sup> 元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一三《內翰李文正公》，頁263。案“李治”之名過去一直譌為“李冶”，清人施國祁、繆荃孫始考辨訂正。說見繆荃孫校勘《藕香零拾》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9，影印清光緒宣統間刻本）本《敬齋古今註》卷末施、繆兩人跋語，頁823—826。

<sup>7</sup> 元李治（案應為“李冶”之譌）《敬齋古今註》（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卷首《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頁1b—2a。案此為《四庫全書》卷首所附《提要》初稿，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二《子部·雜家類》“敬齋古今註”條（頁1050）載錄此文，已被總纂官紀昀輩點竄刪削，語義不夠明晰。

際卻沒有輯錄成書。尋繹其間緣由，或與當時纂修《四庫全書》本偏嗜考據而輕厭論說不無關係，蓋《敬齋泛說》僅看書名就可以知其多屬議論，本冊《永樂大典》引述《敬齋泛說》一條，便是浮泛議論“惟聖人爲能踐形”事<sup>1</sup>。宋元人治學，即便重視對文獻字句的辨析，往往亦如四庫館臣所說，意在佐其思辨議論而已，這與清儒之僅僅關注史事是非的考據，有明顯差別。況且李治論學，本來就特別強調讀古人書“所貴以情得”，重在以意相貫，而不宜孤立、片面地“鑿之又鑿，鑽之又鑽，勞筋苦骨，必待胸喘膚汗、四體不能運掉，而後謂之得也”（實際上這正是大多數清代考據學家的弊病）<sup>2</sup>。所以，要想全面理解李治的思想和主張，甚至對某一問題的具體看法，最好都能同時並觀《敬齋古今註》和《敬齋泛說》。蘇天爵在《元朝名臣事略》中李治的傳記時，就藉用了《敬齋泛說》的很多文句<sup>3</sup>，足見此書對認識李氏思想觀念的重要性。



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謙德堂科《畿輔叢書》本《敬齋古今註》

2013年11月16日記  
刊《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九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6月）

<sup>1</sup> 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新印《永樂大典》卷七七五六之“十九庚”形字“踐形”條，頁20a。

<sup>2</sup> 元李治《敬齋古今註》卷五，頁10a—12a。

<sup>3</sup> 元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三《內翰李文正公》，頁259—264。